

权威与个人

〔英〕伯特兰·罗素著 肖巍译

QUANWEI

GERENGEREN

GERENGEREN

GERENGEREN

GERENGEREN

GERENGEREN

GERENGEREN

GERENGE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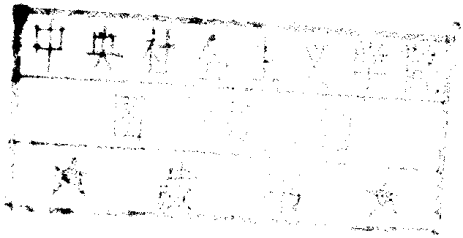
B561-54/12
78302

DF23/05

权威与个人

〔英〕伯特兰·罗素著 肖巍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9886

责任编辑：苏晓离
责任校对：鲁滨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王丹丹

权威与个人

Quanwei Yu Geren

〔英〕伯特兰·罗素著

肖巍译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 2插页 62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ISBN 7-5004-0770-X/B·153 定价：1.80元

D183/05

译者前言

作为一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早已蜚声于20世纪的哲坛。他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开拓了现代哲学的新方向，领导了现代英美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分析哲学。他一生写过70余部著作，其中有20多部是哲学专著。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是一部划时代的哲学巨著。

也许正由于他的哲学成就，人们在看待罗素时，总是慕视他那高高的哲学之巅，而忽视了这位哲人的另一面——作为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罗素。其实，罗素的著作有三分之二是谈论人生、伦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的。在这些方面，罗素不是以他作为哲人所特有的纯理性的思辨和演绎能力来写作，而是以他对人类命运的满腔激情来写作。这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些问题上，我并不

是以我作为哲学家的才能来写作，我只是作为一个经受着苦难世态的人来写作，渴望寻求到某种改造世界的途径，急切地用简洁的语言对那些怀有同样情感的人来诉说。”

罗素一生为之奋斗的价值理想是：在一个违反人类价值的世界里，为人类创造一个由知识所指导、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慨叹人在自然面前的孤立无助，认为人类最终要毁于太阳系的死亡之中，人类成就的圣殿最终要埋葬在宇宙的碎尘之下。他要求人类以自身的相爱来寻求对这种自然悲剧的解脱，每个人都应使生命流溢出爱的光辉，在行进的途中把所有的同伴都看成是同一悲剧的演员、置身于同一黑暗里的难友，以自身的光亮、慈悲慰藉他人之心灵，减轻他人之苦痛，鼓励他人之勇气。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了罗素，他深深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远胜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他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矛盾，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来为人类寻求一条理想的道路。

本书是罗素1948年在BBC广播电台所作的讲演。在这一系列讲演中，罗素把自己多年来对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矛盾的研究成果，用简洁的语言提纲契领地公布于众。

罗素认为，人类种族的绵亘，人类社会的变化，若究其本质，总可以看到有一对贯穿始终的矛盾，即社会控制和个人创造性的矛盾作为推动力。这对矛盾就是罗素在本书中要探讨的问题。这对矛盾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表述：从人性角度说，它可以表述为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矛盾；从社会历史来看，它可以表述为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内聚力与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创造力的矛盾；从社会的构成来看，它可以表述为代表社会性的权威与代表创造性的个人的矛盾。

罗素认为，矛盾着的这两个方面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在一个日趋复杂和危险的世界里，社会控制无疑是必要的，这是社会生存和安定的一个基本条件，否则社会就会失去内聚力，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一个社会不应仅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和安定，它还要发展进步，而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正是这种进步的契机。倘若我们过于强调社会控制，就会窒息个人的创造性，压抑、扭曲人的本性，导致人们的精神死亡和社会进化的停滞；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本来作为人们幸福生活手段的各种制度当成了目的本身，“让人去适应制度，而不是制度来适应人”。因此，取得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平衡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偏重矛盾的哪一方面都会

带来危害。

罗素从人类本性入手，揭示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这对矛盾的根源。他认为，人既不象蚂蚁、蜜蜂那样完全群居，也不象狮子、老虎那样独往独来。人是半群居动物，人性介乎于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人的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和愿望。”而这些冲动和愿望有些是社会性的，有些则是个体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冲突为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矛盾奠定了深刻的人性基础。罗素还把人的冲动分成占有性冲动和创造性冲动。前者表现为追求财富、攫取权力，进行掠夺和侵略，扼杀人的创造性以及投入疯狂的竞争等等。后者表现为诸如知识、爱、艺术等创造一类的东西，它能使人自身完善，推动社会的进程。他认为，社会控制的目的就是把占有性冲动引导到创造性冲动上来，使人的创造性冲动自由地发挥，使人性在不损害社会的前提下充分地释放。

罗素首先深入历史，追溯人类制度的起源，考察社会内聚力的发展过程。他把人看成是社会性动物，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集团内部的团结都有着某种本能作为基础。早期的人类是一个软弱和稀少的种族，它必须生活在各个小部落里，而这些部落受着双重机制的驱使：部落内部的友谊以及部落外部的敌对。部落内部的内聚力正是由于与其他

部落的冲突而得到加强。罗素还分析了使原始人社会内聚力增强的各种因素，如战争、人们认识的发展以及共同的信仰等等。他认为，社会内聚力最初是通过个人心理起作用的机制，与政府毫不相干。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才有了政府，有了必须严格服从的权威，以及大规模的强迫合作。政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冲突。罗素以古埃及、希腊、罗马为例分析了过度社会控制或过度自由所造成的危害，通过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警告人们不能对矛盾的任何一方有所偏颇。他还试图揭示社会内聚力发展的历史规律，认为这是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是周期性的循环往复，另一方面每一循环往复都带来比先前更大程度的社会控制。

罗素接下来又分析了个人的创造性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在非常原始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性很少得到显示，但当人类愈发文明起来的时候，人与人的活动之间就逐渐有了一种不断增大的差异。倘若一个社会要繁荣起来的话，那么它就需要某些并不完全与一般模式相符合的个人。他甚至把实践中的所有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进步都归功于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个人，认为他们是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在回顾了历史之后，罗素考察了在现代科技的

社会里，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冲突，并试图提出一些一般的原则，对社会控制和个人创造性发挥的范围加以界定。现代科技要求人们在大规模组织下生产，而这种大组织势必带来社会控制增长的趋势，使管理者与管理对象日益疏远，使劳动者难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对所从事的工作失去热情。他看到，尽管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讲民主，但这种民主控制本身也是疏远的。它只是在政府机制上成为现实，而没有在心理和情感上成为现实。民主控制的疏远性使人们在这种民主面前只有“发抖和服从”。他提出以恢复自尊、权力下放以及给个人或小组提供独立活动的机会，来缓解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冲突。罗素还根据构成人性的不同种类的冲动，来说明界定社会控制和个人创造性范围的一般原则。他认为对占有性冲动的调整以及依照法律的控制属于政府的基本职能，而创造性冲动则应出自个人或集团的自主性。

总的看来，罗素在本书中揭示了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力的矛盾，并试图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方案，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医治现实社会的弊病，他曾苦苦地思索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罗素身为资产阶级学者，并未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而是清醒地看到这一制度本身

的各种弊病。他在本书中的一些政治、伦理观点都具有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性。对于当时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他抱以极大的关注。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背景，他曾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了考察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也曾亲自到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但苏联之行使罗素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许多偏见，并且顽固地在理论上坚持这些偏见。在本书中的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对苏联社会的攻击。因此，罗素试图超越所处时代的各种理论，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把共产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都看成是两种教条主义信仰。他提出让世界充满爱的人类理想，把建立世界政府作为救世的方案，认为只有建立了世界政府之后，全人类才能和睦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彼此相爱，既没有了战争的苦难，也没有了人与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争斗，斗争将不再是生活的法则，爱国主义也失去了作用，个人的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这一政府能够建立起来吗？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建立呢？建立之后能够稳固吗？罗素自己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说，尽管罗素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出自良好的愿望，但却难免不成为脱离实际的幻想。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本书中，罗素的许多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从人的本能冲动出发探

讨问题，无疑是受到了同时代的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影响，过于注重人的自然本性，忽视了人的社会本质。尽管罗素也认为人性中有社会性的一面，但他只是从人之本能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这种社会性。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罗素在本书中力图摆平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矛盾的各自地位，认为不能对矛盾的任何一方有所偏颇，否则就会带来危害，但却犯了夸大个人创造性历史地位的错误。他把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看成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因素，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格格不入，而且也使罗素本人的历史观不能贯彻到底。他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多元论者，不承认历史过程中有任何一种因果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在这里，个人以及他的创造性却被看成了决定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他理论上的一个漏洞。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受到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何兆武先生的多次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责编苏晓离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也使本书有了很大的改进，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各种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10月

于清华大学社科系

原出版说明

在一个愈发复杂和危险的世界里，倘若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破坏性的话，谋略、审慎和控制——所有这些权威的特性就显得愈发必要。但是，对于具有自主需要和荣誉意识的个人来说，这些特性却造成了不断增长的精神死亡。这两者如何才能协调起来呢？伯特兰·罗素讨论了人类各种制度的起源，以及那些适合于控制的范围（如果控制被广泛分配的话）和那些如果要避免倦怠和停滞不前，就必须允许个人创造力自由发挥的范围。本书由BBC广播电台1948年的里斯讲演汇编而成，在这个著名的系列讲演中率先发表出来。象罗素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它的价值对于今天来说并不逊于它最初问世的时代。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社会内聚力与人性····· | (1) |
| 第二章 | 社会内聚力与政府····· | (16) |
| 第三章 | 个性的作用····· | (33) |
| 第四章 | 技术与人性的冲突····· | (50) |
| 第五章 | 控制与创造力： 它们各自的范围····· | (73) |
| 第六章 | 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 | (91) |

第一章

社会内聚力与人性

在这几讲中，我打算讨论如下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把进步所必需的个人创造力与生存所必需的社会内聚力结合起来。我将从人性中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的各种冲动入手。首先，我将讨论这些冲动在非常原始的社会里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然后，考察由不断变化着的、促进文明发展的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各种适应性。接下来，我将考察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中社会内聚力的范围和强度，这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各个社会以及不太遥远的未来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诸种可能性。在讨论了这种共同支撑社会的力量之后，我将要讨论在各个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人的创造力，说明它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它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以及未来社会中个人和集团的创造力发挥过多

或过少的可能性。我还将讨论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由现代技术所引入的组织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动机与创造性冲动和占有性冲动的分离。在对这个问题讨论之后，我将讨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最后，我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考察个人的思想、努力以及想象力同社会权威的总体关系。

在所有的社会性动物那里，包括人类在内，合作与集团的团结都有着某种本能的基础。这在蚂蚁和蜜蜂那里是最充分的，它们显然从未试图去做反社会的行为，并且从未违背对巢或蜂箱的忠诚。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钦佩这种对社会责任的忠诚奉献，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的欠缺；蚂蚁和蜜蜂并不能制作伟大的艺术品，也不能作出各种科学发现，或者设想出各种教诲说所有的蚂蚁都是姐妹的宗教。它们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机械的、严格的和停滞不前的。因此，若要逃脱这种进化的停滞的话，我们宁愿人类生活具有一种骚乱的成分。

早期的人类是一个软弱和稀少的种族，它最初的生存是不安全的。在某个时期，它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并且失去了用于抓攀的脚的优势，但是却得到了手臂和手的好处。由于这些变化，他们具有了不必再生活在森林中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比起他们在非洲热带丛林中所享受的来说，他们所步入的

广阔天地却没能提供更富有营养的食物。阿瑟·基思爵士 (Arthur Keith) 强调说,原始人每个人都需要两平方英里的地域提供食物,一些其他权威所强调的占居地域的数目甚至更大。类人猿和幸存者于现代的大多数原始社会表明,早期的人类必须生活在比家庭大不了多少的各个小集团里——据猜测,这是些大约在50到100人之间的集团。在每一集团内部,似乎都有相当程度的合作;但是对同一种族的所有其他集团,无论何时发生关系,都怀抱着敌意。只要人类仍旧是稀少的,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是偶然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是无关紧要的。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领土,冲突也只是在边界发生。在那些早期的时代里,婚姻似乎一直被限定在集团内部,以致于必定有相当多的近亲繁殖,各种变异性无论是如何发生的,都将趋向于永久化。如果一个集团的人口数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即该集团现有的领土已经不够用了,那么它将可能与毗邻的某个集团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一个近亲繁殖的集团所具有的超出另一集团的任何生物学上的优势,都可能使它获得冲突的胜利,并因而使它那有利的变异性永久化。所有这些都已由阿瑟·基思爵士很令人信服地提了出来。显然,我们早期的、赤裸裸的人类祖先们不能依据一种慎重考虑的和深思熟虑的方针来行事,而是必须一直由一种本

能的机制——部落内部的友谊和对所有其他人的敌意的双重机制来驱使。当原始部落如此之小时，每个人都相互亲密无间，以致于友好的情感可扩及到相识者之间。

最强有力的、而且最为本能所驱使的社会集团，过去是而且现在依旧是家庭。家庭为人类相当长的童稚时期所必需。它的需要还由于下述事实，即幼小婴儿的母亲在食物采集工作中受到了极大的妨碍。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人类才同大多数鸟类一样，让父亲成为家庭集团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员。这必然导致一种劳动分工——男人狩猎，而女人呆在家里。从家庭到小部落的转变大概在生物学上与以下事实相关联：如果人们合作起来的话，狩猎就能更有成效。并且，从很早的时代起，部落的内聚力就一直由于与其他部落的冲突而得到增长和发展。

已发现的早期人和半开化人的废墟，目前足以提供一幅各阶段进化的完整的、清晰的图画——从最先进的类人猿到最原始的人。人们估计，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无疑是最早期人类的遗迹，属于大约100万年以前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代之前的数百万年里，似乎就有了生活在地上而不是树上的类人猿。可据以确定这些早期祖先在进化中的地位的最大特征是脑的大小；它非常迅速地发展，直至达